

揚帆啟航—— 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

王 惠 珍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中龍瑛宗是少數未曾留過學的作家。1937年4月他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榮獲第九回改造懸賞創作獎，因受改造社之邀展開一個多月（1937年6月1日-7月13日）的帝都之旅。本文根據龍瑛宗所藏的書信資料和回憶文等，統緒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經驗，解開他的記憶密碼，探討他如何利用此行建立與改造社、文藝首都社的互動關係，形成日台文化交流平台，進而說明此行在龍瑛宗文學中的積極意義，釐清殖民地作家與帝國文壇的依存關係。

其次，龍瑛宗在日期間之所與數位文化人的相互來往，留下深刻印象，約可歸納出下列幾項原因：（1）因他在報章雜誌上閱讀有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論後，直接捎信給作者，在此次造訪日本時，經改造社的介紹，取得聯絡進而拜會他們。（2）因《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芹澤光治良、青野季吉都是出身於早稻田的文學者，龍瑛宗對於早稻田出身的文學者相對的較具好感，而對他們留下的印象。（3）經S君的介紹，認識一些在日本曾參與過普羅文化活動的人物。龍瑛宗雖未親身經歷左翼文學運動，但在帝都之旅中卻與左翼文化人進行交流，此趟帝都之旅帶給他不同的左翼經驗。

最後，經由筆者在核對多方資料之後確認，龍瑛宗是搭乘日本郵船的新銳「富士丸」返台，完成他精采的帝都之旅走向他的文學之路。

關鍵詞：龍瑛宗、殖民地作家、帝都之旅、帝國文壇、交流

揚帆啟航—— 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

一、前言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中龍瑛宗（1911-1999）是少數未曾留過學的作家。因此，他進入文壇的路徑模式和多數留日作家迥然不同。30年代初王白淵、張文環、劉捷、吳坤煌等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福爾摩沙》，積極從事文學運動時，¹他仍只不過是位默默無名的銀行小職員，台灣文藝界的圈外人。遲至1937年4月他以處女作〈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參加「第九屆〈改造〉懸賞創作」甄選，在榮獲佳獎之後才正式進入文壇。《改造》是當時日本文壇四大綜合雜誌之一，所以這篇獲獎作品刊載後，隨即受到文壇相當的注目。從1937年3月月底到5月的各大報章雜誌的文藝版或文藝時評專欄中，不時可見到各方評論家對此篇作品所作的評語。²雖然其中各家褒貶不一，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業已為龍瑛宗取得進軍中央文壇的入場券。

在此之前，龍瑛宗未曾在台灣的報刊上發表過任何小說創作，因此他的獲獎消息在台灣文壇引起一陣嘩然。在台發行的報章雖以「中央文壇的慧星」、³「台灣文壇的新人」⁴斗大的標題報導新人作家龍瑛宗，但台灣人的論者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作的評價譏諷多於肯定，⁵這讓剛進台灣文壇的龍瑛宗承受著不少心理壓力。另一方面，1937年7月適逢中日戰爭爆發，台灣

1 柳書琴，〈妖魔之花〉，《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5章（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07）。

2 王惠珍，〈「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に対する日本文壇の批評〉（日本文壇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價），《龍瑛宗研究——台灣人日本語作家的軌跡》2章3節（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5.03）。

3 〈中央文壇の慧星／「パパイヤのある街」の作家／龍瑛宗君を訪ふ〉，《大阪朝日新聞》台版，1937.04.06。

4 〈台灣文壇の新人／颯爽、檜舞台に登場／劉君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懸賞創作 に入選〉，《台灣新民報》，不詳。

5 同註2，2章4節。

文壇陷入一片沉寂，為延續創作生命，龍瑛宗不得不自尋可能的發表管道。返台後，他積極地利用在帝都之行中建立的人脈關係，試圖拓展自己可能的發表空間，藉以磨練自己的寫作技巧和提昇作品的水準。同時，也繼楊逵之後，成為1937年之後在日本文壇為台灣文學發聲的台灣作家。

此次的帝都之旅，雖然已歷經數十年寒暑，但卻深深地仍烙印在龍瑛宗的記憶之中，為他所津津樂道。本文將利用龍瑛宗所藏的書信資料和回憶文等，考究龍瑛宗的帝都之行，以便解開他的記憶密碼，探討他如何利用此行建立與改造社、文藝首都社的互動關係，形成怎樣的文化交流平台？進而說明此行在龍瑛宗文學中的積極意義，釐清殖民地作家與帝國文壇的微妙互動關係。

二、與改造社的交流

龍瑛宗在獲知得獎後，受改造社之邀後隨即向台灣銀行請假，於6月1日⁶抱著愉悅的心情，在基隆港搭乘朝鮮郵輪「新京丸」，航向神戶港，踏上首次的帝都之旅。在6月6日中午11點抵達神戶港，隨即轉搭特急電車「燕號」，於當晚9點抵達東京，⁷下榻於本鄉駒込千駄木町57的愛靜館。⁸翌日一大早便前往改造社拜訪社長山本實彥（1885-1952）。

（一）與山本實彥社長之間的互動

改造社於6月17日在京橋區西銀座之四「樽平」，⁹與「改造當選者會」的聚會一同舉行，宴請龍瑛宗和另一位懸賞創作獎得主渡邊涉。「改造當選者會」原為「改造フレンド俱樂部」。該會會員主要是由「《改造》懸賞創作」

6 根據昭和12年（1937）6月1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今日の船」的記載中，當日啟航前往神戶的船隻只有朝鮮郵輪「新京丸」。又根據昭和12年（1937）6月6日《神戶又新日報》的「けふの神戸港」的記載，當日有來自基隆港的「新京丸」入港。由此可推算龍瑛宗是在6月1日搭船前往日本。

7 龍瑛宗，〈TOKYO・あかげつと〉，《文藝》5-8，1937.08.01。

8 此地址是根據改造社寄給龍瑛宗的昭和12年（1937）6月13日〈郵戳〉的明信片上的住址。在本文筆者所使用的書簡，承蒙「龍瑛宗全集」計畫主持人陳萬益和家屬的協助，得以閱讀龍瑛宗所保留的書簡內容，在此致上謝意。其原件目前藏於國家台灣文學館。

9 同上註。

獎與「《文藝》文藝評論懸賞」獎的得主所組成的。平常大都固定於每個月的20號前後聚餐，當天改造社的編輯人員也會列席，場地則於當日才商定，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也經常到會捧場。¹⁰

從龍瑛宗所收藏寄自山本實彥的明信片與信件中，可以發現龍瑛宗在得獎返台後，仍持續與山本社長保持聯絡。¹¹在書簡中山本社長對他多所期許，鼓勵他多寄些文稿至改造社。山本實彥在1938年1月，在前往南支那途中過境台灣時，兩人也曾於台北相約見面。關於此次會面，龍瑛宗曾回憶到：「突然回想起戰前的事，現在已經倒閉的改造社的山本實彥先生突然來到台灣，我到台北火車站的鐵道飯店去拜會他，當時他正在與台灣總督府的長谷川總督府通電話，他告訴我：『台灣對我而言，因緣匪淺的地方，事實上我的父親追隨西鄉從道來台，最後在石門喪生，這趟想無論如何都得到石門去憑弔一番。』」。¹²根據「〈改造〉刊以前の山本実彦——〈台湾事件〉の連坐」，¹³山本實彥還曾在1914年與板垣退助伯爵相偕來台，他們為了支援政友會的殖民政策，成立所謂的台灣同化會，也就是台灣人與日本人得以自由通婚，該會想以混血的方式確立領台的政策。但是1917年4月山本實彥在故鄉鹿兒島參選第13回眾議員選舉時，在選舉活動中卻因台灣事件而受牽連，被台灣總督府檢舉，引渡來台下獄，最後無罪獲釋。台灣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未釐清。這次選舉抹黑事件的經驗，卻已留給他揮之不去的陰影。總之，無論於私於公，山本實彥社長是位與台灣有著某種特殊關係的人物。

除了接待山本社長之外，因龍瑛宗蟄居台北，偶爾也會接待訪台的改造社記者。例如1939年1月改造社的大森先生來台時，便是由他接待。1939年11月改造社的特派記者中山省三郎與海軍作家部隊一起，在前往廣東途中過境台灣時，便帶著山本實彥的介紹信拜訪龍瑛宗，並致贈自己所翻譯的俄國象徵主義作家索洛古伯（1863-1927）的短篇小說集《かくれんぼ・白い母》。¹⁴由此可知，當時的龍瑛宗是改造社與台灣文化界往來交流的窗口之一。

10 高橋丈雄，〈《改造》當選者會〉，《文藝》，1934.03。

11 1938.08.28（明信片）、1938.11.19（書信）、1938.11.28（書信）、1938.11.29（書信）、1938.12.04（書信）、1939.01.04（明信片）、1939.01.30（書信）。

12 龍瑛宗，「潮州鎮にて」（於潮州鎮），《今日之中國》7-11，1969.11。

13 關忠果等編，《雜誌〈改造〉の四十年 付改造目次總攬》（東京：光和堂，1977.05.25）。

14 歐西茵著，《俄國文學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80.09）。

（二）與改造社編輯部人員間的互動

龍瑛宗曾回憶到：「1937年東京銀座的一家咖啡店，與日本《改造》社主編水島先生喝茶，之後來了兩位作家與水島氏寒暄，經水島氏介紹，我才曉得他們是日本文壇的新進作家，高見順氏與石川達三氏。」¹⁵、「於上野的喫茶店，《改造》編輯員水島告訴我，這次徵文有全國八百餘篇參加，其中，石川達三也投了稿，不過，石川的作品隨即當選第一屆〈芥川賞〉。」¹⁶根據1937年《改造》4月號的「編輯消息」欄的記載，徵文篇數的確多達800多篇，但石川達三卻早在1935年就以〈蒼茫〉一作榮獲第1屆〈芥川賞〉。之後，該作品也被改拍成電影，於1937年5月在台遭到禁演。¹⁷或許因龍瑛宗也曾於1937年在東京與石川有一面之緣，所以時境過遷後，出現了時間點上的誤差。根據以上的兩段敘述，《改造》主編水島治男（1904-？）可能是改造社編輯部接待龍瑛宗的負責人。在他的引薦下，讓龍瑛宗有機會一窺文壇的新銳作家。

另外，龍瑛宗在隨筆中也曾提及，¹⁸在某次聚會中見過《文藝》¹⁹的編輯酒匂郁，那主要是因《文藝》的編輯酒匂郁也曾列席上述的歡迎會。在餐會上龍瑛宗或許曾受編輯人員的邀稿，才將在東京的生活點滴撰寫成〈東京・鄉巴佬〉（原題〈TOKYO・あかげつと〉）寄至改造社，隨即被登載在的《文藝》8月號上。

在龍瑛宗1939年1月1日的日記上，他寫著「改造社的大森先生以快遞送出社長的電報」，這位大森先生與龍瑛宗、黃得時相偕從1月1日起環島5天，在1月6日的日記中，他又寫到「與黃先生一起在山水亭招待大森先生。」之後，龍瑛宗便以環島五天的日記為底稿，將旅途中所見所聞撰寫成「台灣一周旅行」。²⁰於1月23日將稿件寄至改造社的雜誌《大陸》。²¹由此可知，這篇文章的發表可能是受改造社的記者大森先生之邀，針對日本讀者特地撰寫的作品。

15 龍瑛宗，〈文學隨筆〉，《自立晚報》，1986.07.02。

16 龍瑛宗，〈一個望鄉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聯合報》，1982.12.16。

17 〈台灣は特種檢閲『蒼茫』にあらし〉，《日本學藝新聞》，1937.06.01。

18 龍瑛宗，〈知人的死〉，《台灣新民報》，1939.04.08。

19 《文藝》，文藝雜誌，1933.11-1944.09，改造社發行。因應文壇文藝復興而刊行的雜誌。

20 龍瑛宗，〈台灣一周旅行〉，《大陸》2-5，1939.05.01。

21 《大陸》，綜合雜誌，1938.06-1941.12，改造社發行。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專門報導中國和戰地時事的一般性刊物。

（三）小說〈黃家〉的刊載

〈黃家〉（《文藝》8-11）延續〈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題，探討在殖民地台灣社會中，小知識份子的苦悶與處境的作品。1940年年初龍瑛宗將這篇小說寄至改造社時，並未馬上被刊載出來。根據保高德藏寄給龍瑛宗的明信片內容（郵戳1940年2月5日）「下次遇到佐藤先生時，再向他詢問有關你寄至《改造》的作品。」又從保高回覆的明信片（郵戳1940年5月12日）得知，〈黃家〉的原稿，因雜誌社主編業務繁忙，而被擱置一時，之後，才轉而刊載在《文藝》上。

龍瑛宗將〈黃家〉視為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姊妹作。關於當時的評價，他曾回憶說：「《改造》中有關《文藝》等的讀者數問卷調查，結果〈黃家〉的評價不高也不低，點數中等。點數最高的好像是岡本かの子的〈老妓抄〉」。²²根據《文藝》12月號的〈讀者認可什麼？〉（原題：讀者は何をもとめてゐるか？）的輿論調查和〈《文藝》11月號的記事〉（原題：《文藝》十一月號記事のうち），〈島木與阿部對談「生活的文化」〉（原題：島木・阿部對談〈生活の文化〉）的得票數最高 288 票，小說欄的得票數中，芹澤光治良的〈稻をつくる詩〉最高，岡本かの子的〈富士〉得票數則為76票，龍瑛宗的得票數的確「不高也不低」44票。

而且在《文藝》的12月號的「文藝時評」中，也同時對〈黃家〉提出了以下的評語：「致力於描寫地處偏僻的台灣大家族，但是人物的描寫技巧不甚熟練。以纖細的筆觸，很誠摯地描繪出具地方性的特異哀愁，但整體而言缺乏嚴謹度，未能超越同人雜誌小說稚嫩的階段。」可見，龍瑛宗雖然將〈黃家〉視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姊妹作，但這篇作品並未能獲得評論者的肯定，讀者的反應也相當平淡。

除了上述的幾篇文章之外，龍瑛宗也曾在改造社的刊物上發表過〈台灣と南支那〉（《改造》19-15南支那號）、〈葉書隨筆〉（《文藝》6-9）、〈南方だより〉（《改造》20-10）、〈地方文化通信 台北市〉（《文藝》7-5）。

22 龍瑛宗，〈自序〉，《夜の流れ・夜流》（台北：地球，1999.11），頁2。

這些作品大都是配合雜誌編輯所需，以報導介紹性的內容為主。

就改造社出版業者的立場而言，他們希望保有在台的聯絡據點；對龍瑛宗個人而言，在獲獎返台後，面對蕭寂的台灣文壇，急需尋求在內地的發表機會。雙方在各取所需的互惠原則下，維繫著某種良好的互動關係。從他們的互動中，可窺得殖民地作家與帝國文壇的雜誌媒體間的某種依存關係。但返台後，龍瑛宗未進一步主動積極地前往日本文壇尋求可能的發展機會，與改造社的關係也日益疏離。1940年之後，台灣文壇日漸復甦，《文藝台灣》等文藝雜誌相繼創刊，因此龍瑛宗亦試圖將發表空間轉至島內，經營新的發表空間。他與日本內地雜誌媒體的關係，在進入太平洋戰爭之後，改經由《文藝台灣》同人的引薦取得刊載的機會，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將另闢篇章再行探究。

三、與文藝首都社的交流

龍瑛宗在此趟旅次中的另一個重要的收穫，即是與文藝首都社建立互動關係。相對於以市場消費取向來衡量作家作品的改造社，同人誌《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1889-1971）卻是純粹因個人的殖民地經驗，推心置腹真摯地協助來自殖民地的作家。龍瑛宗受到保高的鼓勵，藉由寄稿的方式以文會友與東京文藝界保持關係，和該雜誌的同人、朝鮮作家金史良進行了一段難得的文化交流。

（一）《文藝首都》與主編保高德藏

首先，介紹《文藝首都》（1933年1月-1970年1月）和它的主編保高德藏（1889-1971）。《文藝首都》由保高德藏所主編，是一份為集結文學青年，默默地培育無名的新人作家的同人文藝雜誌。²³這本雜誌在停刊之前，堅持實踐著它的創刊理念，確實培育了不少作家，例如：芥川獎得主半田義芝（〈雞騷動〉，1939年6月）和芝木好子（〈青果の木〉，1941年10月）、芥川獎候選人金史良（〈光の中に〉，1939年10月）等人。

23 同人雜誌是指雜誌的編輯發行，全由該雜誌會員出資贊助，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會員發表作品的園地。

經營這本同人雜誌並非易事，幾乎完全憑藉著保高德藏自我犧牲的決心，在資金短缺等隨時可能停刊的危機下，克服萬難持續發刊，是一本相當難得的文藝雜誌，甚至可將這份雜誌的發行史，視為處於主流出版媒體外非主流作家們的奮鬥史。

主編保高德藏1889年出生於大阪，1915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英文科。同儕中有青野季吉、西條八十、坪田讓治、直木三十五、細田民樹等人，早一兩年的學長有廣津和郎、宇野浩二、谷崎精二等人和其他後輩，皆是活躍於當時的日本文壇的知名作家。他們曾為了保高德藏，友情贊助《文藝首都》的作家對話座談活動，此舉曾傳為文壇的佳話。²⁴

保高的妻子保高みさ子曾在傳記小說《花実の森——小説「文藝首都」》中，²⁵翔實地描寫保高德藏如何鍥而不捨地發行《文藝首都》，並勾勒出圍繞在他身旁的文學青年群像。其中，關於保高德藏為何踏上文學之路和他少年時期的朝鮮經驗也有所著墨。以下引用其中部分的描述。

保高的父親是事業心很重的野心家。在1910年日韓合併前後，日俄戰爭的戰勝國日本國內有許多「ひと旗組」（創業集團）抱持著，一攫千金的夢想前往朝鮮，他的父親便是其中的一位。

從九州用汽船搬運煤炭銷往朝鮮。

當時在朝鮮，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已陸續落實，朝鮮民眾受到總督府統治的壓迫，沒有教養的「ひと旗組」的蔑視和嚴酷不當的對待。不難想像年僅17歲感覺敏銳的他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情境。這也成 他踏上文學之路的原點，進而轉化成他對朝鮮和朝鮮民族無限的關愛之情。

後來，從他創辦《文藝首都》開始，之所以能夠與張赫宙、金史良等朝鮮作家深交，是因為他對朝鮮民族的苦惱和那個國家所處的狀況，皆能深入了解感同身受。

朝鮮時期的保高是孤獨的。

24 栗坪良樹，「文芸首都」，《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東京：講談社，1978.03）。

25 保高みさ子，《花実の森——小説文芸首都》（東京：立風書房，1961.06.15）。

因為野心家大阪商人的父親或是在拜金主義的「ひと旗組」的日本人中，只有他一個人格格不入。當時他以對等的態度與窮苦的下層朝鮮勞動者遊玩、交談時，常受到父親叱責，被在店裡工作的日本人鄙視。他就像水面上的一滴油，唯讀他懸浮在其上，成為異類。

這樣孤獨感與對民族問題的存疑，讓他親近文學，開始亂讀了一些雜誌小說和投稿給讀書雜誌。²⁶

如上所述，朝鮮的生活經驗影響著保高德藏的文學觀和他對待殖民地作家的態度。張赫宙於1932年4月以〈餓鬼道〉一文當選《改造》懸賞創作獎，之後的三個半月皆寄宿在柳橋的保高家。²⁷金史良也在張赫宙的介紹下，加入《文藝首都》與保高成為忘年之交。²⁸

龍瑛宗在此次訪日之前，曾捎信給張赫宙。但當時張赫宙因私事回朝鮮，回函中他建議龍瑛宗一定要拜訪保高德藏和湯淺克衛，因為他們對殖民地的人認識較深。²⁹所以他在抵達東京之後，隨即訪問文藝首都社拜會保高德藏。保高也很熱心地為他介紹日本文壇的近況，並且領著他前往銀座、新橋、新宿等文學家們常出沒的聚會場所。

除了龍瑛宗之外，楊達也與保高有一段私交。³⁰1937年6月楊達曾在東京與《日本學藝新聞》、《星座》、《文藝首都》等的負責人會面，建議他們為台灣新文學設置版面，雖已獲得他們的同意，但因七七事變情勢緊迫而無法實現。之後，他竟於睡夢中，在本鄉投宿的地方被憲官逮捕。事件後，由《大勢新聞》的主筆將他保釋出來。9月返台。³¹在1937年《文藝首都》9月號中，隨即刊載楊達的作品〈《第三代》その他〉。

在當時的日本文壇中，像保高德藏如此關照殖民地作家的雜誌主編並不

26 同上註，頁20-21。

27 同上註，頁65。

28 同上註，頁180-181。

29 參閱註6。張赫宙致龍瑛宗書簡，1937.06.14。

30 「楊先生已返台了嗎？請告訴我他的住址」（參閱註6，保高德藏致龍瑛宗的明信片，1937.07.27）。

31 河原功，〈楊達の生涯〉，《講座 台灣文學》（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03.24），頁 95。

多，特別是在日本普羅文學運動潰敗之後。保高對殖民地作家的友善，並非出自於文學運動的提攜關係或文學理念的契合，純粹是出自於他對殖民地作家的真情誼。他不吝提供《文藝首都》的部份篇幅，充當他們的發表空間，此舉在殖民地文化交流史上，應值得特書一筆。

（二）「文藝首都愛讀者座談會」

《文藝首都》在1936年10月28日舉辦第一次同人大會。為增強雜誌的功能而設立「文藝首都・友の會」，建立會員投稿增刪修改、批評制度。³²決議開放座談會給一般讀者，只要手持《文藝首都》雜誌即可與會，並計畫邀請文壇作家出席座談會。在「各地支部通信」中，記錄在座談會上討論創作欄和新人創作欄作品的內容。³³

但自1938年4月份起，將各個支部的名稱改為「文藝首都讀者會」。其主旨在於重申，讀者會是《文藝首都》的讀者和對文學感興趣的人所成立的「單純的文學同好會，而非思想性的團體」，希望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誤會。³⁴總之，是為了不讓這個會被誤認為是，掩護日本左翼重建運動的讀書會組織。

因保高的邀約龍瑛宗於7月3日，出席在大山舉行的東京支部「文藝首都愛讀者座談會」。從「各支部通信」的出席名單中，可確認出龍瑛宗的名字。當天出席者還有保高德藏、三波利夫、打木村治、寺門秀雄、山本又男、鹽川潔等27名。以下是當天東京支部「文藝首都愛讀者座談會」的記錄。

不巧在隔壁有某校的同學會很吵，但與會者不甘示弱，大聲地抒發己見，高談闊論回應隔壁的噪音，相當愉快。一如往常從新人創作欄到本欄，不斷地進行發表各自的批評意見。其中，有將批評謄寫後唸出的熱心人士、有反駁者、有贊成者，這是場熱鬧的座談會。在本欄的〈部落史〉的批評，因對現今農村狀態的認識有落差，交錯著各式的議論。但這樣的對立也是文首愛讀者的熱心之處，決沒有衍生不愉快的氣氛，是值得引以為傲的座談會。³⁵

32 同註25，頁99-100。

33 〈編集だより〉，《文藝首都》2月號（東京：文藝首都社），1937.02。

34 〈編輯後記〉，《文藝首都》4月號（東京：文藝首都社），1938.04。

35 〈各地支部通信〉的「東京支部座談會」，《文藝首都》7月號（東京：文藝首都社），1937.07，頁190。

在這場座談會上，龍瑛宗認識了三波利夫（1908-1938），但三波於1938年12月英年早逝。為此，他特地寫了〈知人的死〉³⁶一文悼念他，並在文中介紹農民作家打木村治（1904-1990）的作品，文中對當天座談會的情景多所追憶。

（三）《文藝首都》同人

龍瑛宗保留的書簡中，有數封寄自保高德藏的書信。根據郵戳和書信中的日期，可知他在歸台後，仍積極與保高德藏保持聯繫。其中，日期1940年1月9日的回函內容：

依據我的看法，我想如果你成為《文藝首都》的同人的話，將更有機會發表作品，如此一來也有非得寫作不可的機會，就作家活動方面這是很合適的。突然想到誕生台灣文學時，台灣文學會是怎樣的組織呢？若無什麼難處的話，請參加《文藝首都》的同人。

從保高的信件內容推測，龍瑛宗或許在自己的信中提及，在台灣可發表的園地不足等情況。在保高的邀約下，他隨即寄上會費五圓加入《文藝首都》。保高也在收到會費後，立即回函給他。信中內容如下：

信件和同人會費五圓已確實收到。很高興你盡速同意加入成為同人。最近文藝首都同人們也是戰戰兢兢的。本屆的芥川獎也有藤口透吉、金史良兩位被推薦入圍。龍先生也能發展台灣文學亦是好的，但我想還是要與東京的雜誌維持某種關係。因此希望今後開始儘管在《文藝首都》上發表作品。如果遇到「改造」的佐藤先生，我會詢問他有關你的作品之事。你詢問的同人費是每月五圓。我的晚輩在東京接連不斷地出版新人作品集。我也受某間書店之託，推薦一些人的作品。如果龍先生更常在東京發表的話，這是非常好的時機。珍重。

（保高德藏致龍瑛宗書簡，1940年2月5日）

36 同註18。

由此信可知，保高建議龍瑛宗應積極地與東京文壇保持聯繫，期許他繼續努力創作，以來日出版作品集作為目標。之後，保高也時而寫明信片催促他寄稿。³⁷在成為同人之前，龍瑛宗雖曾在《文藝首都》發表隨筆〈東京の鴉〉（1937年8月）、〈わが秋風帖〉（1939年1月）。但在成為同人之後，為不辜負保高的期許，繼而發表了小說〈宵月〉³⁸（1940年7月）、隨筆〈二つの《狂人日記》〉（1940年12月）、〈同人日記〉（1941年1月）、〈熱帶の椅子〉（1941年9月3日）。總之，龍瑛宗在保高的熱情邀請下，於1940年2月他成為《文藝首都》的同人，該雜誌提供他在內地的發表作品和磨練寫作技巧的機會，進而成為他與日本內地讀者交流的一個介面。

（四）關於〈宵月〉的評價

〈宵月〉刊載於1940年《文藝首都》7月號的創作欄。它是龍瑛宗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所發表的作品，也是他成為雜誌同人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創作。全篇共分成四段，小說從描寫台灣教師彭英坤臨終前的樣態開始寫起，彭因苦惱殖民地台灣子弟的教育問題，有志難伸而沉溺於酒精中，最後留下妻小五人撒手西歸的原委。

同年7月在日本各地的讀者會，針對這篇創作進行評論。因為出席者大都是文學愛好者，所以可將他們視為日本國內一般文藝讀者。討論的內容記錄於《文藝首都》8月號的〈各地讀者會〉欄上。與會的同人同時分別就創作欄的〈有形無形〉（鬼生田貞雄）、〈宵月〉（龍瑛宗）、〈水害記〉（白川渥）一一進行檢討。以下是各個讀者會對〈宵月〉的評論部分。

1. 東京讀者會

東京讀者會於7月6日在東京神田舉行。相較於其他讀者會，它的出席人數最多。其中有保高德藏、1940年度芥川獎的候選人藤口透吉、金史良、鬼生田

37 以下是保高寄給龍瑛宗的明信片的部分內容。「在3月號請寫篇隨筆。10張左右。請在2月10日寄到。如果有創作也請記過來」（郵戳1941年1月21日）。「感想10張左右請在18、19號左右寄到」（郵戳1941年10月3日）。

38 宵月：到陰曆10號左右的月亮，即是新月。本文援引日文寫法。

貞雄等21位與會。他們指出：

龍瑛宗的〈宵月〉是描寫友人悲慘的情形，但作者過於逃避於詩中而不能直接面對現實，關於這點遭到批評。寫實地描寫頗具才華，卻墮落於酒精中的主角。若站在台灣本島人作家的立場來看，在現今的情勢中並非不是不可能。有些地方是可以同意金史良這樣的說法。而且根據保高的說法，如俄羅斯帝政末期作家也以同樣的方式，逃進裘契夫詩中的作品，第一次能夠理解作家的立場。（新長記錄）

在這場讀者會後，1941年2月8日金史良寄了一封信給龍瑛宗。³⁹信中也提到他的讀後感。

讀完了兄台的〈宵月〉後令我有一種非常親近的感覺。兄台那裡竟與我這裡在現實上沒有兩樣，令我不寒而慄。當然那篇作品並非揭露現實，而是極其自然地寫出的作品。但我在其中好似見到兄台發抖著的手。或許是我的獨斷、感傷吧。請見諒、請見諒。

可見，同是殖民地作家的金史良對這篇作品中殖民青年的處境和絕望的心境，似乎心有戚戚焉而產生了一些共鳴回響。

2. 神戶讀者會

神戶讀者會在神戶三宮召開，當天只有五位出席。

〈宵月〉——「在開始的地方就告白。我是不太閱讀雜誌什麼的。有時讀是讀了但……」、「我畢竟是一位沒有文化素養的男子，究竟可有雪萊這位詩人？他是哪裡的詩人？不得而知。」作者龍氏在作品中常如此處理「我」這位人物。若就作者而言，或許如此處理「我」是打算將人物客觀化。大致是可以這種方式客觀化的。但在

39 下村作次郎，《文学で読む台湾 支配者・言語・作家》（東京：田畑書店，1994.01），頁212。該原件目前藏於國家台灣文學館。

此仍有作者非得嚴格自我反省不可的問題。若再深入思考，這一定是相當奇怪的問題。

3. 城西讀者會

城西讀者會7月8日下午7點，在中野車站前明治屋的二樓舉行。出席者對〈宵月〉提出意見以下的意見。

龍瑛宗氏的〈宵月〉所看到的是，膽大印象式筆致的可靠性，敘述我這位人物對於那位友人思念的感傷。但是那是散漫的，欠缺文學的統一性。後半部特別是樂在為感傷而感傷。沒有交代彭英坤從學生時代到日後轉變的經過，是最大的缺陷。（玉井記錄）

4. 淡路讀者會

第一次召開讀者會的「淡路讀者會」對這篇作品只簡單地提到：

龍瑛宗的〈宵月〉是好題材，讀後若只探索題材卻相當大的問題。一點都沒有感動毋寧是不可思議，但首先得指出文體與題材間的游離情形。

其他的讀者會如「名古屋讀者會」、「京都讀者會」的記錄內容中，未見與這篇作品的相關評語。

綜觀《文藝首都》的讀者會給予〈宵月〉的評語，似乎提供了，殖民國的讀者如何理解殖民地作家作品的參考值。除了「東京讀者會」，因保高德藏和金史良在會中為龍瑛宗申辯，引領出席者作較具深度的閱讀，因而使他們藉此機會嘗試了解殖民地作家的創作立場。其他讀者會的討論，可知大都就文本中的問題進行申論，作者所欲處理的「殖民地的教育問題」的部份卻未被有效地掌握。⁴⁰

40 下村作次郎，〈龍瑛宗の「宵月」について——《文藝首都》同人金史良の手紙から〉，「第二回台灣本土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師範大學，1996.04）。根據下村的推

若再整理各讀者會中的討論焦點，大都集中於以下的段落：

一踏入他的房內，彭英坤剛好抱著第3個小孩的腳，處理他的大號。不久想到沒有紙，隨即轉過我這頭來。「很抱歉因為衣櫃的第一個抽屜有教科書，可以請您幫我拿出來嗎？」拿出看到那是中學時代的國文教科書。彭英坤接著說。「請撕一張給我」彭英坤拿一張過去，搓一搓，給孩子擦了屁股。

是難得或是懷舊把教科書翻了一翻。到處畫著紅線，可見他下過相當的功夫。

翻到最後封底的襯頁，看到彭英坤的筆跡寫些什麼的。

我已忘了，但我想那確定是雪萊的詩。我畢竟是位沒有文化素養的男子，究竟可有雪萊這位詩人？而且他是哪裡的詩人？無法獲悉。

詩句如下，或許有些錯誤。

你們幾時能再光華鼎盛？

噢，永不再有，——永不再有！⁴¹

現在正感到相當惋惜，當初若能更進一步與彭英坤來往就好了。但是錯失機會，彭英坤為何會變成這樣不得而知。⁴²（下線筆者加）

小說主角彭英坤從學生時代便在校內同好會的雜誌內裏，發表評論關於英國19世紀浪漫派詩人拜倫（1788-1824）等人的作品，並且在「國文教科書」的空白處抄寫同是英國浪漫詩人雪萊（1792-1822）的〈哀歌〉。此處或許暗

論，龍瑛宗是在閱讀金史良的〈光の中〉之後，對照該作品設定人物，嘗試將台灣的社會現狀傳達給日本內地讀者，所以發表了〈宵月〉一作。

41 譯文引自雪萊著，李念慈譯，〈哀歌〉，《雪萊抒情詩選》（台北：五洲，1986.09），頁103。

42 本處的引文是根據1940年《文藝首都》7月號的創作〈宵月〉的文本所譯出的內容。因為收錄於1944年《蓮霧的庭院》（因被禁，未出版）的〈宵月〉文本已被龍瑛宗作出部分的修改。例如「國文教科書」被改成「英文教科書」等。因大東亞戰爭的關係，龍瑛宗如何修訂作品等問題，將另闢篇章再行討論。

示著年輕時的彭英坤曾對這兩位「天生反骨」的詩人的詩作和其生命情調有其共鳴之處。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作者在引出詩句後便停筆，以「彭英坤為何會變成這樣不得而知」一語草草作結。不願對詩作多加解釋，或從正面來說明彭英坤自我放逐，沉淪於酒精的箇中原因。因此，讀者這樣的處理方式略有微詞。

但若再深入追究彭英坤為何撕下「國文教科書」的紙張來擦小孩的屁股？為何引出雪萊的詩句？其實不難發現，作者的憤怒和感傷，即是宣洩在這樣隱晦不明之處。「國文教科書」是日本「國語」的教材，象徵著支配者強制於被支配者的權力符號，同時，也是殖民地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工具。但在小說中教科書的紙張，竟淪為擦拭屁股的紙張。這是因為殖民地青年縱使再怎麼努力學習現代性知識，都將無益於他們的理想實踐與社會地位的提昇。從彭英坤反知識、反理性的行為中，可窺得殖民地作家透過反現代性以達到反殖民性的目的。彭在絕望後任其形體枯槁是他最大的抗議極限。以教科書的紙張擦拭小孩屁股之舉，也正是作者大膽挑戰戰時書寫的可能性和統治者的威權。此外，那位曾是意氣風發的青年所抄寫下的詩句，成為悼念絕望早逝生命的哀歌，這絕非是作者樂在「為感傷而感傷」。

日本讀者因對小說的背景，殖民地支配權力的運作不甚了解，對那被壓抑扭曲的靈魂亦未具同情，他們充其量只能對抄寫在教科書背面雪萊詩句等知識性和文學性的問題進行討論罷了。

龍瑛宗在發表〈宵月〉之後，經由各地讀者會的討論，進而與其他同人有互動的機會。但因這樣的交流並未建立在，讀者對殖民地社會現況有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所以他們無法有效地掌握文本背後，作者所欲訴諸的各種問題和與作品中的反殖民性意涵。從上述的評語中亦可發現，殖民地作家與帝國的讀者之間，畢竟存有著難以跨越的文化、種族、歷史的鴻溝，讀者對作家所欲傳達的創作動機不見得感興趣。因此，殖民地作家為了誘發讀者的興趣，讓更多讀者了解殖民地社會的現況，攫取在帝國的發表機會，則非得調整書寫策略不可。但若只是為滿足讀者對異國風土民情的好奇心，那他們的作品充其量只不過是帝國文壇的裝飾罷了，因此在帝國文壇中殖民地作家的處境有時是相當尷尬的。

誠如，金史良信上所言：「兄台對於〈光の中〉的批評甚為正確，我也由衷地希望來日能夠修訂那篇作品。它並非是我喜愛的作品。究竟那是針對內地人（日本人）而寫的。我也很明白。正因為太清楚，反而覺得害怕。」⁴³雖然無法得知龍瑛宗的信件內容，但是從金史良的字裡行間似乎透露著，同是殖民地出身的兩人皆警覺到自己的作品，是「針對內地人（日本人）而寫的」，擔心執筆時可能因太屈就於日本讀者的閱讀偏好，而喪失殖民地作家的主體意識。同時，他們也清楚意識到，作品若無法被日本讀者正確地解讀，其存在意義與價值將受到質疑。殖民地作家究竟應如何在維持創作的自體性，透過作品與帝國的讀者建立閱讀的可能性，這是希望立足於帝國文壇的殖民地作家都面對的兩難考驗。這恐怕也是兩人最感到忐忑不安的地方吧。

四、與日本文化界的交流

龍瑛宗在東京的滯留期間，曾一個人獨自到東京丸之內的T銀行。T銀行總社有幾位認識的同事，其中一位是曾在台北總行共事過的S君，當天晚上S君介紹他的兄長佐佐木孝丸給龍瑛宗，並且帶他到新宿。而S君是東大文科的轉系到經濟學部的異類，曾有一段時間相當熱衷於文學，非常喜歡閱讀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也因兄長的關係，認識很多文壇的人士，也曾與龍瑛宗談及許多有關這方面的事。⁴⁴T銀行應該就是龍瑛宗任職的台灣銀行，但S君何許人也？目前尚有待釐清。根據龍瑛宗的描述，這位S君應該是位台灣有所了解的文學愛好者，承蒙他的引薦，讓龍瑛宗認識左翼演劇家佐佐木孝丸，並與日本左翼文化人有進一步接觸的機會。

同時，此行龍瑛宗以新人之姿拜訪會見昭和10（1935）年代幾位著名的文化人。在晚年的回憶文中，他不斷地追述憶及當年訪日的情形。他雖博學強記，但因事隔多年，記憶已見斑駁模糊之處。因此他並未詳述當時的對話內容，只約略地提及當時的談論話題。筆者試圖歸納整理龍瑛宗的回憶文中言及

43 同註39。

44 龍瑛宗，〈東京の鴉〉，《文藝》5-8，1937.08。

阿部知二、森山啟、芹澤光治良、評論家青野季吉（1890-1961）、劇作家佐佐木孝丸等人的部分記錄，希望勾勒出龍瑛宗在帝都之旅中與日本文化界實際交流的概況，藉以說明這趟帝都之旅在龍瑛宗文學運動中的意義。

（一）阿部知二

阿部知二（1897-1978）身兼小說家、評論家、英美文學研究者數職，既是文學家也是教育家、啟蒙者，是文化運動的旗手和進步的知識份子的代表。所以同時也是昭和10（1935）年代的中堅作家之一。⁴⁵

龍瑛宗可能在讀過阿部知二的〈新人の作品二つ—『改造』に現れた龍、石和両氏—〉（《報知新聞》，1937年3月27日）之後，曾主動捎信給作者。在他抵達東京後，輾轉從改造社收到寄自阿部知二的信件。⁴⁶

關於此次的會面，他回憶到：「民国26年我赴東京，阿部知二先生來函希與我相聚，乃於一天晚上拜訪於阿佐ヶ谷他的家。阿部先生去過大陸，發表了名作《冬天客棧》，揚名於日本文壇，阿部先生暢談北平的風光多麼美麗舒適，其實我未曾到過大陸哩。」⁴⁷、「他聊著中國故都的風光是多麼好，空氣非常乾燥，不像日本濕氣多，談得很愉快。不久他的《北京客棧》（註：其實是《冬天客棧》）問世，竟名震一時。阿部是東京帝大出身的作家，不過，日本文壇自來多為東京帝大、早稻田大、慶應大出身者所形成。」⁴⁸、「阿部先生讚揚了台北帝大擁有3位英文學學者，是矢野峰人、工藤好美、島田謹二的諸教授。最好你登門請教。」⁴⁹根據以上的回憶內容，我們可略微窺知當時兩人的對談內容。但或是因為阿部對殖民地台灣的情況認識有限，為找尋話題而提及自己的北平經驗，想必當時的龍瑛宗也只能默默地聆聽阿部的講述吧。另外，由於阿部身兼明治大學英文科的教職，所以對台北帝大的師資亦有所了解，建議龍瑛宗若有機會可以向他們請益。

45 小田切秀雄，〈人と文学〉，《筑摩現代文学大系55 阿部知二・中山秀義》（東京：筑摩房，1975.05）。

46 阿部知二致龍瑛宗書簡，日期1937.06.15。

47 龍瑛宗，〈讀書遍歷記〉，《民眾日報》，1981.01.08。

48 龍瑛宗，〈怎麼樣也看不懂〉，《開南校友通訊》，1986.07.15。

49 龍瑛宗，〈一個望鄉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聯合報》，1982.12.16。

龍瑛宗返台後，配合《改造》的南支那號的發行，發表了〈台灣と南支那〉。⁵⁰文中寫到「南支那是祖先們的心中的故鄉」，感嘆「現在年輕的本島人對南支那的知識較內地人無知」，或許這是在拜訪阿部知二之後有感而發的感慨吧！

（二）森山啟

森山啟（1904-1968）既是小說家、詩人，也是評論家。他的處女作〈何も持たぬ男〉（一無所有的男人）發表於1928年《プロレタリア芸術》3月號。是位具有「自然詩人」的資質，纖細純情的「生活詩人」。他主要的評論舞台是「納普」解散後的《文學評論》，他也是位相當著名參與社會主義寫實主義論爭的論客，在日本接受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影響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從加入《文學界》到《文藝》上發表〈收穫以前〉（1937年2月）後開始轉向，回歸小說創作。轉向後，以家庭為重，抱持著「政治是風，自己是柳，逆來順受」的態度。⁵¹

龍瑛宗關於與森山啟來往的點滴，曾的回憶到：「我於東京訪問了森山啟先生，我與他散步於豪德寺境內，談論著文學與政治諸問題，迄今還歷歷在眼前。」轉向後的森山曾在他的評論中兩度提及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將它視為深具人道主義的作品⁵²。兩人見面時，究竟關於這篇作品交換過什麼意見，不得而知。若就二人「談論著文學與政治諸問題」的提示，或許是因為當時殖民地作家與日本內地作家，同處於言論箝制日形嚴苛的創作環境中，而以此話題來紓解在那個時代裡作家們的共同苦悶吧！

龍瑛宗是透過怎樣的關係與森山啟取得聯繫，雖不得而知，但因戰前龍瑛宗有購閱《都新聞》的習慣，⁵³而森山啟的〈新人の二作——頹廢の情痴と苦

50 龍瑛宗，〈台灣と南支那〉，《改造》南支那号，1937.12。

51 平野謙，〈伊藤永之介・本庄陸男・森山啟・橋本英吉入門〉的「森山啟」，《日本現代文學全集 89》（東京：講談社，1980）。

52 〈新人の二作——頹廢の情痴と苦悩の真実感〉，〈文藝時評〉，《都新聞》，昭和12年（1937）04.05；〈文藝雜記帖〉，《中央公論》5月號，1937.05。

53 龍瑛宗，〈多些文藝評論〉，《民眾日報》，1979.09.17。「日據時代除了島內的報紙以外，我還訂購東京的都新聞（後來改名為東京新聞）。這個都新聞是以注重文藝著名的，它把文藝欄刊載於第1版，第2版才是政治方面的文字，所以愛好文藝的人士多購讀該紙，

悩の真実感〉即是刊登在《都新聞》的文藝欄上，所以他可能在拜讀過森山啟的評論後，寫信給森山啟取得聯絡，因而有機會造訪森山。返台後，在1938年他曾收到寄自森山的一枚新年賀卡，之後，兩人是否有其他的書信來往等，便不得而知。

（三）芹澤光治良

芹澤光治良（1903-1973）曾於1930年以小說「ブルジョア」一作入選《改造》懸賞創作獎，所以他也是「改造フレンド俱樂部」的會員之一。因此龍瑛宗對他留下一些印象。「關於作家和時代的盼望，曾經與前輩作家芹澤光治良（以前當過日本筆筆會會長）大嘆難做作家經。」⁵⁴、「新宿有名的中村屋附近，在一家鮮果店裏，我會晤了作家芹澤光治良氏。他是《改造》的入選作家，我向前輩請教了很多文學問題。」⁵⁵

芹澤獲獎時，川端康成曾在「文藝時評」欄中指出「芹澤光治良的文學，既不「好色」也不「好戰」，只有修行優點的芹澤文學是不可能受到大眾歡迎的。」芹澤在自己的自傳小說《人間の運命》（1962-1968）中也談到，走過半世紀的作家生涯，「一言以蔽之便是孤獨，與其說是文壇支持我，不如說是那群默默無聞認真的讀者支持著我。」⁵⁶因此，在當時文壇中扮演著配角的芹澤與龍瑛宗談到「作家與時代的盼望」，大嘆作家難為的苦楚，是出自他的肺腑之言。文壇新人龍瑛宗利用這次見面的機會，積極地向芹澤討教文學上的一些問題。

龍瑛宗在1938年也有收到芹澤光治良的賀年卡。另外，從1945年張赫宙寄給龍瑛宗的明信片中，張也提到芹澤曾對他提及龍瑛宗的事。而芹澤對於殖民地作家究竟抱持著怎樣的態度呢？從以下他給張赫宙的「忠告」中可略見一二。芹澤在評論張赫宙的「愛怨的園」時，曾提出以下建言：

可謂特豎一幟的存在。」

54 龍瑛宗，〈秀姑巒溪在呼喚〉，《自立早報》，1989.04.13。

55 龍瑛宗，〈回憶七七抗戰〉，《幼獅》，1985.07。

56 進藤純孝，〈芹澤光治良人と文学〉，《石坂洋次郎・芹澤光治良》（東京：筑摩書房，1979.03）。

為了作家的成長，不可以離開故鄉上京來。我總覺得為了要擁有著柔軟的靈魂與性格，就得在故鄉才能以反映鄉土的味道，替換成悲慘民族更為激烈的憤怒。但若是蟄居在東京，因敏銳度的降低，一味只接受著各式各樣的影響，將使自己被壓垮，包括處女作以來作家所擁有的特長，在內心裡將被摧毀殆盡吧，對此同是作家的我出自疼愛之情而感到擔心。⁵⁷

可見，芹澤認為張赫宙若要保有殖民地作家的特色，就應該回歸鄉土。在回到那土地上與殖民地上的人民一起生活，才不至於被日本文壇同化。張赫宙並未接受他的勸告，最後放棄了作為朝鮮人的自豪，戰後歸化成為日本人，選擇在日本文壇中圓自己的文學夢。

芹澤是否也曾對龍瑛宗提出這樣的忠告，不得而知。但這位對殖民地作家曾寄與關心的日本作家，在他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青野季吉

龍瑛宗曾說過：「我所接觸過的日本作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青野秀（筆者按：季）吉，這個佐渡島出身的文藝評論家，給我啟示不少。」⁵⁸為何他如此憶及青野季吉呢？若閱讀他的小說〈歌〉的幾段描述，⁵⁹將可窺得一二。

說到這位白濱，是當今文壇上第一流評論家，他的論著，李東明也經常留心細讀。在這樣的場合見面，真是作夢也沒有想到。

李東明是高峯所主持的《文學主潮》同仁之一，高峯則是早稻田的文科出身，跟同科出身的白濱，還有了不起的讀書家獅野慶三，天生性格奇怪的大眾作家、已故的真木五十三等人，都是莫逆之交。（略）

白髮童顏的白濱有點口吃，訥訥地說。（略）

57 芹澤光治良，〈文藝時評〉，《都新聞》，1937.05.04。

58 龍瑛宗，〈我的足跡〉，《南開校友通訊》，1984.07.01。

59 龍瑛宗，〈歌〉，《台灣文藝》2卷1期，1945.01.05。

白濱起身，向木河雙手一拱，訥訥然地說起來。

「木河兄你以是日本人的身分到馬尼拉去的，在那邊從事音樂指導的工作。這實在是件好事。但你以日本人身分去，什麼都不必帶。但只有一件東西你不能忘記，非帶去不可。木河兄，那就是日本人的愛。你將日本人的愛帶去，之後，什麼都不必了。」

在那張年過五十的臉上，竟洋溢著年輕的熱情，眼眶濕潤。雖然他口齒不甚伶俐，卻一個一個字地打進人家的心坎裏。

若將小說人物對照參考龍瑛宗帝都之旅的行程，將可推論出其中被擬定的幾位作家。例如，從台灣來的李東明是龍瑛宗的虛擬人物，高峯則是《文藝首都》的保高德藏，和高峯同是「早稻田的文科畢業」、「文壇上第一流評論家」、有口吃的特徵的白濱則是青野季吉的化身。

同樣患有口吃的龍瑛宗能在那場聚會中，見到崇敬的評論家青野季吉，想必令他感到十分興奮。來自殖民地的他又聽見青野熱情洋溢地高談著他的「愛情論」想必他的內心亦有戚戚之感。

（五）佐佐木孝丸

如上所述，龍瑛宗經「S君」的介紹，認識他的兄長佐々木孝丸（1898-1986）。在小說「歌」中「笹村的兄長在我國的演劇界中知名的人物。李東明乃是經由弟弟的介紹得知的。」他也曾回憶說：「我曾在昭和12年於日比谷的美松見過新劇作家佐々木孝丸。佐々木先生跟我說。越南人被法國政府禁止閱讀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這樣的話讓我想起了被殖民者的悲哀。」⁶⁰由此可推論笹村就是「S君」，而笹村的兄長便是佐々木孝丸。

另外，「歌」中也有一段描寫他們的對談內容。

某年夏天，有一次李東明和笹村兄倆在有樂町的「新東京」，雜在人群中邊喝啤酒邊聊日本的演劇界。李東明建議他，希望與他有關

60 龍瑛宗，〈《文芸台灣》と《台湾文芸》〉，《台灣近現代史研究》3，1981.01.30。

的劇團，也能到台灣來作巡迴演出。之所以那麼說，是因為台灣的演劇界一向保守，不過近年來有蘊釀革新的機運，新劇運動已經在新的熱情中開始推展開來，如果此時，在技術、內容上皆有較高藝術性的內地劇團到台灣的話，想必一定可以帶來新鮮的氣息與刺激。與笹村相關的劇團，已經到朝鮮巡迴演出多次，因此對演劇完全外行的李東明還是提出希望該劇團前往台灣演出的建議。

笹村的兄長靜靜地笑著說：「台灣是很想去，但總有種種不便。」他舉了幾個困難條件，流露出遺憾的表情。雖然如此，但他仍熱心地詢問著有關當今台灣演劇界的情況與文化方面的事情。

雖然聚會的時間、空間可能是虛擬的，但談話內容則卻相當具體，符合實際人物身分和特質。龍瑛宗或許也曾藉由與佐々木孝丸見面的機會，希望他的劇團也能來台巡迴演出。

綜觀龍瑛宗在日期間之所與這些文化人的來往，留下印象，約可歸納出下列幾項原因。首先是，他在報章雜誌上閱讀有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評論後，直接捎信給作者，在此次造訪日本時，經改造社的介紹，取得聯絡進而拜會他們。其次是，《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芹澤光治良、青野季吉都是出身於早稻田的文學者。或許因為如此，龍瑛宗對於早稻田出身的文學者相對的較具好感，而對他們留下的印象。而且在龍瑛宗的回憶文中，也曾提到「日本文壇自來多為東京帝大、早稻田大、慶應大出身者所形成。早稻田大學是日本自然主義的大本營，他們對我比較待以好感。」⁶¹「出了銀座往〈コンパン〉去，在那裡遇見，現在剛剛成名的石川達三、高見順、福田清人、田村泰次郎等人。」⁶²

小說「歌」中，白濱（青野季吉）與笹村的兄長（佐々木孝丸）的形象描繪地較為具體。若進一步考察兩人的文學活動經歷的話，他們皆同屬日本普羅文學運動中，劃時代的重要刊物《種蒔く人》（播種人）、勞農藝術家聯盟的

61 龍瑛宗，〈一個望鄉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聯合報》，1982.12.16。

62 龍瑛宗，〈芥川賞の「鶏騒動」—『文芸首都』と保高さん—〉，《台灣新民報》，1939.08。

刊物《文藝戰線》的同人。青野季吉於1933年起在日本文壇、論壇上發表一連串支持行動主義的評論，致力於以人民戰線的人道主義立場，來展開他的評論活動，邊撤退邊反抗法西斯主義。而佐々木孝丸是自參加秋田雨雀的劇團「先驅座」開始，便從事普羅演劇運動，是活躍於トレンク劇場、前衛座、左翼劇場的核心人物。由此可知，龍瑛宗在日本的停留期間中，經S君的介紹，認識一些在日本曾參與過普羅文化活動的人物。這些左翼知識分子的精神與他們對殖民地的同情態度，讓初訪帝都的龍瑛宗倍感溫馨親切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為，1937年普羅文學運動已被禁止，若考察以上5位文化人的文學活動，除了佐々木孝丸之外，其餘的4位皆是，以「文學」之名對抗日漸跋扈的集權者《文學界》⁶³的同人，亦是當時掌握文壇實權的知名作家。回憶文是作者選擇後的記述，歷經數十寒暑，經歲月的淘洗後，龍瑛宗將與這些同時代的日本作家交往的點滴，成為他個人記憶的一部分。其中，龍瑛宗雖未親身經歷左翼文學運動，但在帝都之旅中與左翼文化人的交流中，卻帶給他不同的左翼經驗。

五、帝都之旅

缺乏留學經驗的龍瑛宗，對東京懷著相當大的憧憬。在此次的帝都之旅中，除了拜會日本文壇的知名作家、文化人之外，也在幾位友人的陪同下，親自體驗見識東京的現代性文明。當時的東京不僅是日本的首善之都，也是東洋最具現代化、高度資本化的城市。他雖對這個城市充滿著好奇心，但卻未被它的五光十色所眩惑，他以敏銳知性的眼光，冷眼靜觀東京這個現代化都市的街景。他雖對日本的現代性文明讚譽有加，但也對資本主義化後的日本社會仍抱著存疑的態度。

63 《文學界》（1933.10-1944.04），是普羅作家林房雄和武田麟太郎、藝術派核心批評家、成名作家廣津和郎、宇野浩二等人呼籲而發行的同人雜誌。是轉向作家、藝術派、成名作家三派吳越同舟，以「文學」之名對抗日漸跋扈的集權者。以「擁護純正文學的權利、確立新世代文學的文學者自衛運動」（武田麟太郎）為目標，有其象徵性意涵。這本同人雜誌是主導昭和10（1935）年代，「文壇強者聯盟」的刊物（高見順）。（東鄉克美，〈文芸復興期の模索〉，《時代別日本文學史事典現代編》（東京：東京堂，1997.05），頁100-109。）

在他的日記體〈TOKYO・あかげつと〉和〈東京の鴉〉中，雖可嗅聞龍瑛宗因身處異國而散發出的淡淡旅愁。但在「H君」⁶⁴的嚮導下，將在東京都內的丸之內、銀座、新宿等到橫濱、鎌倉等地的所見所聞，如遊記般地一一詳實地記錄下來。其中，讓龍瑛宗感到驚訝不已印象最深刻的是，「洞穴的住家」與「花枝招展的舞者」。

（一）洞穴的住家

對龍瑛宗而言，在此次的見聞中，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則景象，恐怕是東京的貧民窟及流浪漢的身影。

「在那裡我見到相當奇妙的事。總之，即是看到人住的洞穴。覆蓋著蓆子，死人般地睡著。親眼目睹史前時期的原始人的生活，轉而感慨萬千。」

「往深川方向走。經過濱園街的貧民窟後，東京市垃圾處理場的煙囪如象徵著時代，瀰漫著混濁的煙。一進入工廠，正如置身在充滿著塵埃的世界中。這是我未曾想像過的。不清潔的東西堵住我的胸口。」

來自殖民地的旅人龍瑛宗，目睹流浪漢生活在都市邊緣的情景，想必內心的相當地複雜。貧民窟與東京市垃圾處理場的煙囪，象徵著東京的在資本主義化後孳生的產物。遊走於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讓他所認知的與所想像的帝都產生了若干的落差。特別是，當他撇見貧無立錫之地的流浪漢及貧民窟時。雖然未見他對此開展他的文明批判論，但行旅中他似乎也意識到，日本內地也瀰漫著「時代沉重的煙霧」。

64 龍瑛宗在〈東京の鴉〉中曾提及「H君」是他的同鄉友人，就讀早稻田大學法科。經筆者查閱《早稻田大学名簿》和昭和13-17年（1938-1942）的《早稻田学報》3月號的畢業生名單。雖然標記「台灣」的學生有幾位，但仍無法確認出與龍瑛宗同屬新竹北埔出身的「H君」。

（二）花枝招展的舞者

另一個讓龍瑛宗錯愕不已，留下深刻印象的，即是他與H君一起到日比谷東京寶塚劇場，觀賞寶塚少女歌劇雪組的演出。對寶塚劇場的豪華排場，女扮男裝也感到相當驚奇。戰爭時期劇團流行演出，與時局相關緊急態勢的戲碼。從戲目「拍扇子」的「神風凱旋祝賀の〈遂げたり神風〉一曲」等廣告詞中，想必當日的戲碼中，也必然摻雜著宣傳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內容。⁶⁵但他只言及日本西化的現象，「在西洋的輕鬆歌劇，來到東洋的君子國後變了個樣，相當有趣。例如，女伴男裝等。」⁶⁶但他對帝國主義在日本內地的猖狂情況，或許因有所顧慮而加以保留。

白天見到流浪漢的生活與夜裡劇場豪奢的舞台秀形成強烈的對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使他感慨良多。「東京是新的西洋的東西與舊的日本的东西雜然交錯而成的特異的城市。」「東京的優點與可怕之處，已有所了解。看個人的決心，是上進或是墮落。而且還得看你有〈錢〉與否，東京是天堂也是地獄吧。」「日本之所以偉大，在於它富有科學精神的知性。」⁶⁷在一個月左右的旅次中，龍瑛宗對日本現代性的知性文明持著濃厚的興趣，同時，也具體地了解到社會在資本主義化後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和現象。

小說家龍瑛宗以纖細浪漫的感性，傳達文學的美感經驗；評論家龍瑛宗卻深具冷靜且敏銳的觀察力和批判精神。旅途中的見聞，讓他重新觀察認知日本實際的社會現狀，是他最大的收穫。無論是在戰時或戰後初期，龍瑛宗皆相當強調「現代化的知性」與「近世的科學文化」的重要性，在他負責《中華日報》日文版時，還特地開設了「知性之窗」的專欄，他認為知性的解放與社會政治的民主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龍瑛宗文學的知性面應該再作深入的考究。

65 根據1937年6月2日《東京日日新聞》的廣告，寶塚少女歌劇雪組的演出戲目分別是，布來雅·羅茲（ブライア・ローズ）、扇拍子、芭比結婚（バービーの結婚）。

66 同註7。

67 同上註。

六、烽火中的返航

在龍瑛宗的數篇回憶文中，皆曾提及當年自己是在七七事變爆發時，搭乘郵輪返台。但郵輪的船號卻有「富士丸」與「高千穗丸」兩種不同的記憶。⁶⁸為確認龍瑛宗返台的時間，究竟搭乘哪一條輪船返台，便有其考證的必要。筆者將根據他的回憶文、當時報紙所刊登的「輪船時刻表」、神戶港與基隆港船隻旅客出入境報導參照比較。

關於《日本學藝新聞》的消息欄記載著，「龍瑛宗7月4日晚上從東京出發，經大阪、京都於乘坐7日的船返台」⁶⁹，但查閱6、7月份的《神戶又新報》、《神戶新聞》的船隻出入港時刻表，7月7日並無駛向台灣基隆港的船隻。

《神戶又新報》、《神戶新聞》的輪船時刻表中，航駛神戶基隆的船隻，有預定於7月9日出港的日本近海郵船「富士丸」、7月11日出港的船隻則有大阪商船「高千穗丸」兩艘。7月7日的《神戶又新報》〈けふ神戶港〉中則有「富士丸」在港內的報導。7月13日的《台灣日日新報》有「富士丸入港」的報導，這艘船隻於12日中午11時停靠基隆港，總乘客有531名及部分旅客的名單，但卻未見龍瑛宗的姓名。另一艘郵輪「高千穗丸」則是於7月14日才停靠基隆港。⁷⁰因為這兩艘郵輪的出入港時間相當接近，因此龍瑛宗將當年所乘坐的郵輪的名稱記錯了。

〈一個望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中龍瑛宗寫著：「回程搭乘〈高千穗輪〉，船中發行油印號外，蘆溝橋發生了事變。雖然未能意料其演變，但是，胸中一片黑雲飄來飄去。」在〈回憶七七抗戰〉中寫著：「〈富士輪〉仍然向南方航去，也許靠近沖繩島附近，是七月七日或八日早晨，各客艙裏頒布了油印號外，以大字印著寥寥數行消息：『蘆溝橋畔不法之徒支那軍隊，竟敢向皇軍發炮了，日本帝國為了世界和平，馬上還擊矣。』云云。」在「抵達神戶港後，搭乘了大阪商船〈富士輪〉，這新下水未久的一萬噸級巨船，慢慢地

68 〈一個望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聯合報》，1983.01.01，船名是「高千穗丸」；〈回憶七七抗戰〉，《幼獅》7月號，1985.07、〈我的足跡〉，《開南校友通訊》，1985.07，的船名是「富士丸」。

69 《日本學藝新聞》35號，1937.07.10。

70 根據1937年7月14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今日の船」的記事。

遊弋於風光明媚的瀨戶內海。右看下關港，左望門司港的狹窄海道，巨輪進了浪花飛濺的玄界灘了。巨輪行馳於九州島上，我憶起鄭成功曾居住過的平戶島。是那一個島影呢？還有五島列島，長崎港呢？我也茫然不知到它們的蹤影。」由此可見，龍瑛宗是在船艙內得知中日戰爭爆發。實際上日本的新聞是在7月9日晚報上，才開始以頭條新聞報導蘆溝橋事變。龍瑛宗所拿到的，很有可能是7月9日晚報發行之前的號外。

綜合以上所述，龍瑛宗在7月4日離開東京後，便前往神戶港等候船位返台。7日「富士丸」已在港區停泊，當時他已準備搭乘9日前往基隆港的「富士丸」返台，因而在船艙中得知蘆溝橋事變的消息。因為高千穗輪7月11日才啟航，所以號外的消息在船艙中閱得的可能性不高。「富士丸」在不受戰事影響下，從神戶港啟航，順利行駛在神戶基隆之間的航線上，於7月12日上午11點平安駛進基隆港灣。

七、結語

龍瑛宗在考量個人家庭因素之後，結束自1937年6月6日到7月9日一個月左右的帝都之旅返台，錯失繼續留在東京一圓作家夢的機會。這個抉擇對他而言成為他文學生涯中的一大憾事，日後在他的作品中也一再反覆地被提及。⁷¹他雖未能留在東京文壇尋求發展，但這趟帝都之旅奠定了他與改造社和文藝首都社的互動關係，確保了他返台後的發表空間。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雖為龍瑛宗取得進入帝國文壇入場券，但在帝國文壇中殖民地作家創作的自主性、作品的定位、日本讀者的接受度等問題，皆讓龍瑛宗感到焦慮不安。畢竟，日本內地讀者對南國殖民地台灣是相當陌生的，殖民地文學與帝國讀者的關係，其實是建立在相當薄弱的認知基礎上，就文學市場的客觀環境，不見得利於龍瑛宗留在帝國文壇發展。

71 根據筆者訪談龍瑛宗的次子劉知甫的記錄（2002.08.22），龍瑛宗的二哥劉榮瑞台北師範學校音樂科畢業後，隨即前往花蓮明義公學校（現在花蓮市明義國小）任教，因胃病而早逝，享年42歲。留下6名子女。龍瑛宗為照顧姪嫂而放棄留在東京返台，關於這個缺憾在可見於他的小說〈白色的山脈〉（原題〈白い山脈〉）、〈歌〉等。

龍瑛宗在這趟旅行中的另一項收穫，即是與知名作家的相逢。他積極地利用各種可能的管道與當時的文壇作家、評論家、演劇家等展開交流對話。誠如小說〈歌〉的人物李東明冷眼觀望著日本文壇的動向和作家之間的交友關係。有幸參加在日本普羅文學運動重建失敗後，左翼文化人士的私人聚會活動。雖然高唱「愛情」論是客籍作家龍瑛宗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小說的主要基調。但為何他遲至戰爭末期1945年2月，才發表這篇追溯殖民地青年孜孜不倦學習「國語」和他的帝都之旅，在戰時高唱「民族融合」、「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下，似乎隱微暗藏著普羅國際主義的思想，關於龍瑛宗文學的思想本質將值得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歸航之後，龍瑛宗在文壇並未就此一帆風順，而是被捲入中日戰爭的烽火中。作家的言論空間受到壓縮，創作題材不斷被當局干涉，因此他只能擺蕩於創作自主與戰爭協力之間，尋求書寫的可能性，或許這就是龍瑛宗文學為什麼隱晦費解的原因之一吧！

在1937年4月6日《大阪朝日新聞》的「台灣版」的版面上，刊載「訪問中央文壇彗星〈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作者龍瑛宗」（原標題「中央文壇の彗星 “パパイヤのある街” の作者龍瑛宗君を訪ふ」）與「新銳富士丸六日初進基隆港 盛大舒適的」（原標題「新銳富士丸六日基隆初入港 盛大なアットホーム」）的新聞標題在同一版面以粗黑的字體被刊出。龍瑛宗有幸在歷經精彩的帝都之旅，結識了一些日本文壇友人後，於7月9日乘搭這艘新銳「富士丸」返台，正式躍上文壇。之後，展開他的作家生活，尋求可能的發表書寫空間，在戰火中心驚膽跳地匍匐前進。但這艘「富士丸」卻在太平洋戰爭中1943年10月27日從基隆出港航向日本時，被魚雷擊中而沉沒。⁷²

龍瑛宗有幸躲過空襲的砲彈，卻也歷經過政權遞嬗戰後初期的失業、跨語等問題。文學是他的最愛，從未放棄作為一位作家的矜持，持續航行於文學的婆娑之洋，不斷透過閱讀保持知性的成長，為再度回歸創作航道作準備。

72 《日本郵船戰時船史》（東京：日本郵船株式会社，1971.05.01），頁378-383。

參考資料

- 柳書琴，《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07）。
- 王惠珍，《龍瑛宗研究——台灣人日本語作家の軌跡》（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5.03）。
- 關忠果等編，《雜誌〈改造〉の四十年 付改造目次総覧》（東京：光和堂，1977.05.25）。
- 歐西茵，《俄國文學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80.09）。
- 保高みさ子，《花実の森——小説文芸首都》（東京：立風書房，1961.06.15）。
- 河原功，《講座 台灣文學》（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03.24）。
- 下村作次郎，《文学で読む台湾 支配者・言語・作家》（東京：田畑書店，1994.01）。
- 小田切秀雄，〈人と文学〉，《筑摩現代文学大系55 阿部知二・中山秀義》（東京：筑摩書房，1975.05）。
- 伊藤永之介・本庄陸男・森山啟・橋本英吉著，《日本現代文學全集 89》（東京：講談社，1980）。
- 石坂洋次郎・芹澤光治良，《石坂洋次郎・芹澤光治良》（東京：筑摩書房，1979.03）。
- 《時代別日本文學史事典現代編》（東京：東京堂，1997.05）。
- 《日本郵船戦時船史》（東京：日本郵船株式会社，1971.05.01）。
- 《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東京：講談社，1978.03）。

